

HANYU YANJIU DE LEIXINGXUE SHIYE

石毓智 著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

● ● ● ● ● ● ● ● ● ● ● ● ● ● ● ●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江西教育出版社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

-07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 石毓智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研究的类型学视野/石毓智.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9(2005.5 重印)

ISBN 7—5392—4262—0

I. 汉... II. 石... III. 汉语—语言学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092 号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

HANYU YANJIU DE LEIXINGXUE SHIYE

石毓智 著

责任编辑 吴明华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URL: <http://www.jxeph.com>

E_mail: 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40 号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青年报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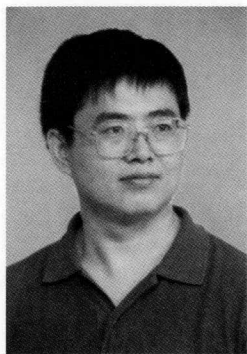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310 千字 印数:1000—4170 册

ISBN 7—5392—4262—0/H·39 定价:24.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石毓智 博士

作者简介

石毓智，1963年生，中原洛阳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理论兴趣为语法化理论、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研究领域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语言和文学之关系，在这些领域都已经有论著发表。

内容简介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就是把汉语的研究放在人类语言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由此出发可以让传统研究课题重具活力,发现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洞悉一种语言的设计原理,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本书的内容涵盖面很广,包括汉语句子的基本语序对其整体语法特点的影响,上古汉语代词的语序问题,汉语方言中反映出的类型学问题,词汇向语法标记演化的认知基础,现代汉语疑问手段的特性,汉语概念化的特点对其语法的影响,汉语的大音节构造,语法的历史层次,语法的规律与例外之关系,等等。它们大都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交叉问题,资料的来源除了古代、现代和方言外,还征引了大量的其他语言的材料。本书具有资料 and 理论双重价值,适合所有对汉语感兴趣的朋友。

Abstract

Typological vision in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refers to 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exploring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From this field of vision, we can discover many new topics, reveal the principles of the designs of a language, and make our analyses meaningful for development of general linguistics. The coverage of this book includes (a) the effect of the basic word order of Chinese on its overall properties of grammar, (b) the special word order of pronominal words in Archaic Chinese, (c) typological correlations among the dialectal grammars of Chinese, (d) properties of Chinese question words, (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ceptualization and grammar, (f) the macro-syllable of Chinese, (g) the historical layers of grammar, and so forth. Most these problems belong to interfaces among phonology, lexicon, and grammar. Data is drawn from modern and classical Chinese, Chinese dialects, and many foreign languages. This book is valuable and stimulating, empir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for reader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摘自《诗经·鹤鸣》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摘自苏轼《题西林壁》

前 言

类型学的研究简单地说,就是跨越一个单一语言系统的研究。它跟为了教学而作的两个语言的异同比较是不一样的,也跟以寻找不同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我们所提倡的类型学视野主要是指,从跨语言的角度,选定研究课题,搜集材料,论证问题,探求人类语言共性背后的机制,寻求形成语言结构多样性的原因,从整体上把握汉语的特性,研究汉语跟别的语言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本书就是我们这个追求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书中所讨论的问题跨度很大,但是具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一致的追求。

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眼光”现象可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类型学研究。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该书的结构和理论系统基本是模仿西方的语法学著作,虽然被批评为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但是其中的不少分析已经成了今天汉语语法学的核心内容,而且很多论述至今还很有启发性,其创建之功不可磨灭。后来的很多研究也一直离不开对西方语言学的借鉴。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呼吁,汉语的研究不能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应该尽力摆脱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眼光,要重视汉语自身的特点,建立自己特色的语言学。但是,我们认为,印欧语眼光自身并没有错,问题就出现在只用印欧语的眼光看问题上。从文化和经济上讲,说印欧语的国家是最强大的,但是从语种上,它们在世界的六千余种的语言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就语言学的价值来讲,任何一种语言,不论大小,具有相同的地位。那么如果我们在观察研究汉语现象时,如果只跟印欧语相比,结果就只能看到跟印欧语有关

的现象,然而那些无关的地方,就可能视而不见,甚至因为戴着印欧语言这幅有色眼镜而加以扭曲。所以我们提倡汉语研究不仅要跟印欧语言相比,还应该跟其它各种语言相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汉语自身的规律。那种再重新关起门来照着镜子自我欣赏的研究,更不可取,因为它们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汉语研究如何跟国外接轨,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拿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研究是否已经接轨了呢?是不是说在国际一流刊物上登了文章,就意味着达到了国际水准,就意味着汉语的研究走向世界了呢?我们借著名作家王蒙讲述的电影界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张艺谋是打入国际电影界最成功的一个导演,其中一部电影叫《大红灯笼高高挂》。故事中的男主人有四个妻妾,各住一院,晚上要在哪个院子歇息就点亮哪个院子的红灯笼,要冷落谁就熄灭她的院子的红灯笼。很多普通的西方人都是通过电影来了解中国文化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看了这个电影,竟以为红灯笼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他们有些人来北京旅游时,看到天安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就挤眉弄眼,露出诡秘的笑。张艺谋在打入国际影坛方面成功不成功?真成功,无人可比。那么,要问张艺谋的电影有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敢说。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电影中扭曲中国的情况远远比反映的实际情况要多得多。用著名作家王蒙的话来说,我们的导演还摆脱不了“他者”的地位,始终抱着一种“被看者”的心理,揣摩“对方”的喜好,估摸人家期望从我们这里看到什么,扭捏作态以引起对方的注意。我们看了不少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汉语的文章,也读了不少国外用英文写的汉语言学著作,觉得情况有点儿类似。这种轨道上的汉语研究很容易迷失方向,甚至连家也找不回来了,更遑论接轨,还不如我们的传统语言学研究稳妥。我们认为,就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长远利益来讲,只有师各种学派之长,用跨语言的视野,借鉴与语言有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深

人调查汉语的事实,揭示汉语自身的规律,才真正是最有价值的。

今天的汉语研究跟西方语言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禅”的阶段。回顾过去,汉语学界与西方语言学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闭关自守?西天取经?打坐参禅。在开放之前,我们的汉语学界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的状况,学者来往隔绝,书籍也禁止看,人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闭关自守”阶段。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交流逐渐开始了,很多学子负笈西去求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则日趋频繁,把很多新鲜的思想、方法引入到汉语研究之中;与此同时,大量的西方语言学著作也开始在国内发行。这是“西天取经”时期。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看作西天取经阶段。从九十年代初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增加,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新的语言学思想可以很快地接触到,跟国际可以说是同步的。今天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有追求新思想的意识,你就可以马上得到你最需要的最新理论发展;只要你掌握好了英语这个工具,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就在你的面前,通过伊妹儿一天之内可以与遥远国度的学者问答多个来回。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可能专有某种理论,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所拥有的发展机遇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大家比的是一种“悟性”,在有关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从汉语事实中悟出汉语自身的规律。因此我们把这一阶段叫做“打坐参禅”。当然,这种“参禅”跟传统的做法不一样,不能闭目净心,要对外界的变化具有敏锐性,要“心注”在汉语的境界里,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说我们跟西方语言学界的关系进入了“禅”阶段,是强调今天不必经过千山万水的艰苦跋涉去西方托“经书”,就可以读到真经。这类似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在初期人们需要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天取经,但是到了经书多了以后,就转入“禅”的阶段,领悟阐释便成为首务。但是搞语言学研究跟“参禅”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能“闭目静思”,必须下拙功夫。这个拙功夫就是语言事实的

调查。在调查语言事实上,也有“巧”和“拙”之分。语言有自己的性格,只有长期跟她在一起才能了解她。所以我们提倡大量地观察、调查语言事实,培养自己的语言感觉,形成贴近语言事实的哲学观,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分析上的偏颇。现在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大大降低了语言检索的劳动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反而会带来语言研究的危机。计算机检索只是在统计一些数字时很有用,可是不能帮助我们发现规律。如果一个初学者一开始就依赖计算机检索,就非常不利于语言感的培养,因为要检索什么取决于我们脑子已经有的东西,没有想到的根本就不会去检索。而且规律往往是在“有”和“无”之间才能表现出来,检索只能告诉我们“有”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无”,所以很不利于规律的总结。我们始终坚持多阅读,多积累语言事实,才能不断从中“悟”出新东西。

在武汉读研究生时酷爱过一段围棋,除了钻研过如何布局、抢占中场、死活手筋等专门书籍外,还经常跟同学鏖战至第二天凌晨。到美国学习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使得我无暇顾及此道,一心扑在各种语言学理论上。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围棋生涯并不完全是虚度光阴,因为围棋中包含着很多哲理,可喻战争、生活、甚至学术。各种语言学流派和研究风格可以用下围棋的道理来说明。形式学派和认知学派都宣称自己研究的是语言中的认知问题,两者追求虽同,但理论观点针锋相对,方法迥异,与其说是殊途同归,不如说他们都是在争认知科学这个大场。乔姆斯基学派主张直捣人类的心智,认定人类语言有一个先天的、自足的普遍语法,原则着各种具体的语言,但是因缺乏经验证据,始终从假说的云端里下不来,总让人觉得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之味道。乔氏理论追求犹如下围棋执黑先行,第一子就落在了棋盘正中间的那一位置——天元,表面上看起来左右逢源,雄踞中原,虎视八方,感觉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但是这盘棋如何往下走明眼人一看便知。相比而言,认知功能学派的人,常从具体的现象入手,通过归纳演绎,一步一步搞定

语言中的各种具体认知问题,逐步围拢自己的理论中心。这好比他们始终遵循着“金角、银边、草肚皮”的古训,先从根基牢靠的角边开始安营扎寨,逐渐挺进中原,步调井然,布局合理。这种下棋方式外行人也许会觉得步调太慢、太笨,甚至会笑话你着子莫名其妙,但是如果对手是先占“天元”那种的,棋不用走几步,胜败已见分晓。下围棋最讲究的是要有一个全局观,落子虚实得当,要使每一步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千万不要把祖先传下来的古训理解偏了:既然你说是“金角”,我就把子放在最角落的地方;既然你说是“银边”,我就把子排在边线的位置上;既然你说“草肚皮”,我想都不去想它。这种行棋方式,你排的子再多,也只能是死子、弃子。虽然没有人是这样下围棋的,但是我们汉学学界却不乏乐此不疲的实践者。此外,我们也不主张只在二路上爬一味求活而不顾全局输赢的下法。按照围棋之道,落子既要能够守住边角的“实地”,又利于蓄积向外扩展的厚势,最后占有中腹的“虚地”。当今汉语研究状况,走两极端的居多:要么如乔氏学派行棋,一子投在“天元”,四周落空,棋再也无法下了;要么是子落在最边角的位置,没有效率,最终成为废子。我们觉得理想的研究应该是,讲究布局,虚实得当,每走一步都要心怀全局。作者在这里说这些话既不是为了自诩又不是为了嘘人。现以棋喻学,是想与同道共勉,因为知道下好汉语研究这盘棋需要许许多多的人的共同智慧和努力。

如何选择研究课题?小至一篇文章的写作,大至一生的学术追求,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王国维把这一学术探讨的第一阶段诗化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

这是以诗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东方思想者的形象。诗人

很勤奋,对外界的变化很敏感,昨夜西风使他一夜没有安睡,联想到了许许多多。这与“春眠不觉晓”、“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处世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选择观景的时辰也与众不同。一般的人都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郊游、踏青,然而秋风萧瑟之时大都蜷缩在锦衾之中“庄周晓梦迷蝴蝶”。春天的景色固然赏心悦目,但是绿凋叶落之时方能显示事物的本质。秋冬之交是一个大自然轮回的完成,是一个收获季节的终结,同时孕育着新一轮生机,即将来临的冬季充满着各种机遇,我们选择了什么,种下了什么,决定我们明年的收成。当此之时,大自然的本质才裸露出来,诗人一大早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一人登上高楼,望到远方的目标。我们做好任何事情都是如此,要勤奋,留意外界的变化,把握住时机,不凑热闹,具有独行的精神,站的高看得远,目标一旦选定,要坚定地走下去,为了找到“灯火阑珊处”的伊人,即使“衣带渐宽”、“消得人憔悴”也决不放弃。当“蓦然回首”见到“那人”时,等待我们的将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丽景观。

年轻人大都有个偶像。不同的人崇拜不同的对象,有些人崇拜政治家,有些人崇拜企业家,有些人崇拜艺术家,我则崇拜一位老人家——唐朝诗人柳宗元《江雪》中的那位寒江垂钓者。我经常拿柳宗元的蓑笠翁来激励自己,使得我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痴心不改,执著于汉语研究。我觉得蓑笠翁他老人家的以下气质和精神值得我个人学习。

蓑笠翁倔犟执着,不畏寒霜风雪,垂钓不辍。

他知道收获可能是微薄的,但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念,相信终有所获。

他不怕冷清,不凑热闹,耐心沉着。

他静观尘世,历尽世态炎凉,永葆自己的操守。

他不谄媚权贵,不羡慕虚荣,乐于自己的清贫生活。

他行事向来独来独往，因为晓得拉帮结派，就不能垂钓。

他不去管别人的闲言碎语，明枪暗箭，自己认定的事情就去做。

他的人生哲学是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干活。

他没有什么奢求，只希望靠自己的双手能够养家糊口。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蓑笠翁的品格，这也就是在所有的唐诗中我最喜欢《江雪》一首的原因。我个人是个凡夫俗子，但是愿以蓑笠翁的精神来勉励自己，也愿意与年轻的同道朋友共勉。

做学术研究如同走路。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在远方，就知道自己前面的路子还很长，他就会不知疲倦地赶路，因为只有走完眼前的这段路，才能走下一段路，才能早日实现他的目标。如果一个人走路只是为了好玩，为了消遣，没有明确的目的地，那么他走起路来就会东张西望，走走停停，看到路边众多的馆舍，一会儿停下来饮茶，一会儿停下来喝酒，如遇到高老庄之类的地方就可能停下来安居乐业，不再往前走了。如果一个人走路是为了寻官觅爵，就会遇到官府衙门就拜，一旦被收留，路也就算走完了。还没有自己路子的人，会彷徨、会观望；走错路子的人，会沮丧、会懊悔。然而赶路者时常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他们在旁边闲言碎语，指手画脚，更有甚者则给你挖陷阱，放冷箭。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赶路者依然会大踏步向前走，因为他心中只有远方的目标。

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自己这些年做了一些事情，师长们对我的进步感到欣慰，朋友们为我感到高兴。他们原谅我的过失，赞赏我的进步。这是我努力工作的精神原动力。我跟汉语言学的渊源已经近 20 年了，这期间倍尝求学的艰辛，历尽生活的波折，风风雨雨，朝夕浸染其中，殚精竭虑，不敢有怠。虽自知天生愚钝，但是我能看到今天的景观，是机遇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为了后我而来者故，不避繁难，不计荣辱，把失败和艰辛的经历写

下以供借鉴,把赏心悦目的美景描下以共享。做汉语研究就像一个探险家和旅行家,路边的景物告知自己是在往前走的,走的路长了,跋涉的时间久了,胆子也就大了,信心也就高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把自己走过的路记录下来,把坎坷和平坦告诉后来者,让他们少受坎坷之苦,继续往前走。汉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负载着几千年灿烂的文化,为当今海内外炎黄子孙联系的纽带,探索其中瑰丽多姿的景观实为不朽之盛事,怎能个人的荣辱、得失而荒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不管是吸收外来的东西也好,继承传统的东西也好,学术的发展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新的学术思潮的出现,往往不是学者个人的爱好。最近一二十年来,语言学思想空前活跃,但是它们必须与汉语已有的研究传统相结合,只有那些可以深化我们已有的语言知识的研究方法才能站得住脚,只有那些可以拓宽我们已有的研究领域的理论才能找到观众。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别的,跟学术发展的历史逻辑有关。前人的探索是我们今天研究的起跑线,他们的成功和失误都对我们今天有用,成功之处自然使知识的阶梯加高了,失误的地方也可以警示我们少走弯路。我们的语言学领域需要有拓荒者,也需要有人耕耘在我们祖上传下来的良田上。这两股力量只有合在一起,在劳动力投入上合理,才可以使我们的家业壮大。

我们所作的任何一种理论追求,就好比一棵树苗,它要茁壮成长,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必须植根于汉语事实这块沃土之上。我们深信,这种“深情藏沃土”的研究,其生命力是强大的,一定能够做到大树一样的自信: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首,冰雪压不服。

我们的类型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拥有丰富的

的语言学矿产资源。资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语言,二是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中国境内有一百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具有明显语法差异的汉语方言点也有好几百种。汉语方言语法跟普通话的差别十分大,有不少是该方言区的人的语言创新,它们具有很高的类型学研究价值。如果我们的汉语研究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天然资源,不仅可以大大拓宽对母语的研究范围,而且也可以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具有普通语言学的价值。

不仅如此,类型学在中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还与中国人在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有关。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方式,还制约着我们的思维习惯,甚至也反映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农业社会强调的是一种实用主义,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素观念作为自己劳动力投入的价值标准。所以纯粹思辨的东西在这里很难找到他们的市场。类型学就是这样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语言学理论,它的基本操作方式就是“从事实中来、还到事实中去”,从事实的调查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本书中部分内容已经在《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外国语》、《世界汉语教学》、《民族语文》、《现代中国语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等上发表。这是第一次把它们整理成系统的专著,向广大读者请教。本书第八章关于“给予”类动词演化成汉语被动标记的机制,是我的学生孙淑敏的研究成果。因为跟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征得她的同意,编入本书。这一章的功劳完全属于她的。本书第十章的内容是根据我与张莘老师和大西智之朋友的共同研究成果改编而成的,这里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承蒙吴明华先生的长期的大力支持,我的《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和《语法的形式和理据》已经先后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最后我想套用李白的两句诗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明华待我情。

石毓智

2004年5月新加坡国立大学